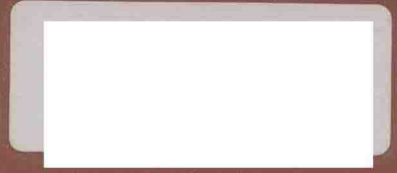


○陈晶 著
○常州博物馆 编
上册

漆石汇
陈晶考古文辑



○陈 晶 著 ○常州博物馆 编 上册

漆石汇
陈晶考古文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漆石汇：陈晶考古文辑 / 陈晶著；常州博物馆编. —北京：文物出版社，2016. 7

ISBN 978 - 7 - 5010 - 4562 - 4

I. ①漆… II. ①陈… ②常… III. ①考古工作 - 中国 - 文集
IV. ①K87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63150 号

漆石汇——陈晶考古文辑

著 者：陈 晶
编 者：常州博物馆

封面题签：谢辰生
责任编辑：孙 霞
封面设计：程星涛
责任印制：张道奇

出版发行：文物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东直门内北小街 2 号楼
邮 编：100007
网 址：<http://www.wenwu.com>
邮 箱：web@wenwu.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印刷
开 本：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48.5
版 次：2016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7 - 5010 - 4562 - 4
定 价：188.00 元（全两册）

本书版权独家所有，非经授权，不得复制翻印

是珍藏，更觉温暖

(代序)

我乃一名普通的文物考古工作者。从踏出朝气蓬勃的校园，便跨进了古物成堆的博物馆，我径自选择了一条寂寞的人生之旅。一路航程，付出了岁月，也收藏了一叠旧船票，至今近一个甲子了。

从济南到常州，我一直在基层的博物馆里蹲守，然而命运让我抓住了一些机遇，在踏上起跑线时，就遇到不少资深专家指点迷津。刚到济南市博物馆时，馆里就让我参加编写大汶口新石器时代墓葬发掘报告，我是学历史专业的，对考古工作还十分懵懂，何谈编写报告呀！山东省文物考古队的杨子范先生手把手指导我在库房整理、排墓葬器物、写卡片。曾经在 20 世纪 20 年代参加过城子崖遗址发掘的刘锡增副馆长则给我开出一份书单，都是 20 世纪 50 年代和之前出版的考古发掘报告，包括《城子崖》《貔子窝》《赤峰红山后》等报告。读书，实践，对比研究，有很好的效果。山东大学的刘敦愿老师、考古所山东队的吴汝祚老师，以及与我年龄相差无几的毕业于北大考古专业的学人，还有参加大汶口墓葬发掘的师友，都是我的启蒙者，时至今日我还时常怀念山东工作这段“黄金时代”，在一大帮亦师亦友的同行中如鱼得水的快乐情景。而真正带我进入课题研究行列的导师是北大苏秉琦老师，他与我的业师柴德赓先生是老同学，柴师把我当面介绍给苏先生：“这个学生现在改学考古，我已教不了，一定请你收下。”苏先生确是我投入考古专业角色的引路人，指导我完成了参与《大汶口新石器时代墓葬发掘报告》这部学术著作的任务。

调到常州市博物馆后，我想探索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序列。在基层虽说是“单飞”，却也得助于苏、浙同行，尤其是周边基层博物馆同行的支持，使我对这一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考古工作树立了信心。差不多与吴县草鞋山遗址发掘同时，1972 年开始我们组织了常州市圩墩遗址的考古发

掘，连续发掘三次以后，苏秉琦先生特别指出要总结过去的工作成果，要走新路、开创新起点，对太湖流域古文化这个研究大课题，还应从方法论上有所突破；并提出有必要进行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结合，通过一个具体遗址，作全面细致的解剖，就能发现考古文化的具体内涵、发展序列，发现生产技术、生活关系及习俗的变化，揭示客观历史本来面貌。不久，常州市博物馆与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合作对圩墩遗址的再次发掘，以考古为核心，组织古人类、古生物、古地理、古气候、树木学等方面研究人员在现场考察、取样分析，各学科都取得了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令人感到遗憾的是，未能将这一项有意义的工作，得以相继完成；未能将多次发掘资料综合研究并与自然科学的成果报告（已发表）一并汇编成册。我期待有生之年把对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的阶段性认识及 20 世纪 80 年代田野考古发掘工作中进行“开放型”、“互补型”的多学科合作研究的实践及有关资料一并收录成册。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以后，常州邻近地区和邻省杭州、湖州、温州等地区不断出土五代、宋、元时期珍贵漆器。关于古代漆器的考古，对我来说当时还是“盲点”，对新出土的五代、两宋漆器的研究和保护毫无头绪，一筹莫展，忽地又得贵人相助。史树青先生指点：“研究古代漆器非找王世襄先生莫属。”世襄先生将他潜心研究数十年著述的《髹饰录解说》油印本寄给我，使我有机会系统地学习了古代漆器方面的基本知识，相继 30 年来在通信中他悉心指导我学习探究，我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函授生”。假设“函授生”是学院式的教导途径，那么另一位贵人上海博物馆的吴福宝老师则是探索古代漆工艺的优秀匠师。我也真应感谢上海博物馆严谨、深沉、不苟言笑而对文物保护重视至极的沈之渝馆长，是他指点我应多向匠师学习的途径。当时吴师傅已注意到宋代漆器又轻巧、又结实、不变形的制胎工艺特点，而在明代黄成《髹饰录》里并无记载。他虽然只是读过小学的文物修复工作者，却前卫地应用传统与现代科技相结合的方法，完成了宋代漆器圈叠胎工艺制作的课题研究，使失传千年的漆工艺获得传承，填补了《髹饰录》一项空缺内容。在他取得每一步骤成功时，他必在通信或面授中毫无保留地为我诠释，使我对唐、五代、宋元漆工艺研究提高了水准，把握了鉴定技法，也让我在中国古代漆器研究中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基础。

退休之后，我有了更宽的自由空间。世襄先生力荐我主编《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国漆器全集》第四卷，使我有机会在编写中系统梳理了自己的专

业知识，感受到活到老、学到老的快乐。晚年也实现了我与海峡彼岸中华考古同仁学术交流的愿望，台湾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古代漆器中，关于两晋、南北朝及唐、五代、两宋出土漆器是一片缺页，于是我选择这方面的资料，试着撰写考释文章。又将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马家浜文化的出土文物以及早年收集到有关新石器时代出土骨角工具一些老资料，整理成老文物新思考篇，向台湾《故宫学术季刊》《故宫文物月刊》投稿，受到欢迎，得到鼓舞。去年春还实现宝岛之行的夙愿，与台湾同行交流研究成果。

考古工作确实需要比较凝重的氛围，但考古工作者笔下流淌的应该是生机与热忱。退休之后我致力于探索将具有考古专业水准的题材，写成通俗易懂的随笔，得到文汇报《笔会》编辑部的认可，先后刊发 20 余篇。能让这些多年尘封的旧船票登上《笔会》时尚的客船，我觉得十分欣慰。

我收藏着一批纸质书信集，都是工作以来向专家、学者、工艺匠师求教学习的反馈，弥足珍贵。从这批书信中，不仅可以看到专业方面的资料，有的还是极为难得的专篇论文。如沈从文先生毛笔书写七页的长信，是古代扇子考证的一篇遗稿；又如谭其骧先生的书信，不仅一丝不苟地答复我向他请教关于古奄城的问题，而且还是一篇关于“奄”考证的重要论述之遗稿。

我特别钦佩老一辈的学者，用毛笔写稿、写信，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这一优秀的传统，渐渐消失了。书信中有沈从文、王世襄、陈从周等前辈的墨宝，还有沈玉成任《文物》编辑时给我的墨书信件，这些而今都成为有价值的藏品了。

一叠旧船票，能够有机会再在阳光下晒一晒，作为我与文物考古结下不解之缘的记录，也作为再次感谢人生路上给我温暖的前辈与同仁的由头，我释怀了。

目 录

第一辑 考古足迹

大汶口新石器时代墓葬发掘编写经过	3
马家浜文化两个类型分析	10
圩墩、寺墩遗址墓葬习俗浅析	
——兼析太湖流域马家浜、良渚文化墓葬习俗	19
常州市圩墩遗址的分期	
——兼谈马家浜文化的分期	27
说 釜	37
中国扬子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木器应用	47
发掘工作中多学科的合作研究	55
江苏武进县上渎村晚更新世哺乳动物化石	59
江苏常州圩墩村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与试掘	63
常州圩墩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三次发掘简报	73
江苏武进潘家塘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与试掘	92
江苏省江阴县大松墩土墩墓	98
吴王阖闾第八子墓葬考	100
江苏武进县出土汉代木船	104
常州南郊戚家村画像砖墓	109
江苏武进村前南宋墓清理纪要	121

第二辑 漆器巡礼

夏之漆	141
三国至元代漆器概述	149
记江苏武进新出土的南宋珍贵漆器	176
常州北环新村宋墓出土漆器	181
常州等地出土五代漆器刍议	186
苏州瑞光寺塔藏嵌螺钿经箱小识	191
发掘出土明代漆器集锦	194
解读“库露真”	207
寻觅《茶具图赞》中宋代漆茶具	210
喜识雪域藏珍元代戗金漆印盒	213
《漆艺骈罗 名扬天下》序	215

第三辑 台海交流

菱莲、稻米、船櫓、木枝、骨艺	
——圩墩新石器时代先民生活小景模拟	219
麋鹿的奉献	
——新石器时代的骨角工具	232
两晋、南北朝漆器赏析	244
探宋时“一年景”	254
暗香浮动月黄昏	
——寓情林逋梅花诗的出土文物	262
“元代红”素面漆器考释	266
探析明洪武、永乐朱漆戗金器	
——兼谈明墓出土黑漆戗金器	277
唐五代宋元出土漆器朱书文字解读	289

第四辑 《笔会》小札

严复信札存伪与杨度晚节正名	331
绿色时尚在两晋	333
上巳话流觞	335
弥足珍贵的遗稿 ——沈从文先生书信遗补	337
笔敬匠人之巧	341
上海人认祖归宗	344
寂寞林公碑	346
漆器色流看皇朝	348
宋徽宗“无”字碑 ——读古代碑刻铭文上的简体字	351
宋扇拾遗	354
菱芡双清	357
王世襄先生二三事	360
舒芜先生的两位挚友	363
李根源先生在苏州	366
西塘的漆工	370
我识谢公	373

第一辑

考古足迹

大汶口新石器时代墓葬发掘编写经过

1959年春，津浦路兴修复线，宁阳县堡头村大汶河畔地面露出一批新石器时代遗物，济南市文化局派刘锡曾同志前往工地调查。刘早年曾在吴金鼎等先生主持的城子崖龙山文化发掘队工作过，他看到的这批新石器时代遗物与早已闻名世界的山东龙山文化出土遗物面貌迥然不同，立即收集标本带回济南，向考古界前辈王献唐及山东省文物管理处的同志展示。杨子范同志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当见到这些红陶、彩陶、灰陶、黑陶和蛋壳陶片时，如同见到陌生人，相对无语，实在叫不出名姓来。”这批使人耳目一新的史前遗物，吸引了文物考古工作者，一种强烈的事业心、责任感，无需以任何形式再进行动员，领导和专业工作者的思想一下子就统一起来，一致认为必须立即奔赴遗址地点，进行发掘。

山东省文物管理处、济南市博物馆，在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山东工作队协助下，组成一支考古队，这支队伍大多是中青年考古工作者。当年6月下旬进行全面发掘，一座又一座墓葬被揭开，出土了一批又一批罕见的器物。天热，发掘队员的心更热。工作条件十分艰苦，有的墓坑既深又窄，在墓坑中剔骨架、清理随葬品、绘图，无不是细功夫，有时实在闷热得使人透不过气来。因为必须抢先在大汶河水位高涨之前把这片墓地清理结束，他们不得不在天蒙蒙亮就起身，天一亮就开工，啃着窝窝头、煎饼，起早摸黑争时间去工作。

9月初工地工作结束后，器物全部运回济南，在趵突泉公园一所小院内汇报展出。这次发掘是50年代末轰动考古界的盛事，时值中国历史博物馆开馆陈列，一部分墓葬器物随即提调到中国历史博物馆，充实原始社会发展史陈列。紧接着就是要尽快整理出书。

《大汶口》新石器时代墓葬报告的整理、编写，杨子范《对山东史前考古追述与瞻望》一文中，已有部分追述。这部报告的整理始于50年代末，1963

年写出油印初稿本，1964 年完成定稿本，由于“文革”，稿本搁浅未能付印，直至 1974 年始克出版。编写这部报告的时间，恰恰处在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变革时期，一方面在寻找一条考古文化研究的基本方法途径；另一方面对于考古学研究中器物排队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烦琐哲学”的批判风浪尚未平息，客观环境给研究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一、编排 133 座墓葬的活页本还是编写一本课题研究报告

当时对报告的编写，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只要求将 133 座墓葬，按墓编排出活页本报告即可出书，这样做仅仅是单纯公布资料，决不能作为推动考古学研究的手段，意义不大，也不可能认识这一遗存的真面目；另一种意见是，通过这处遗存的整理研究，打开一扇山东新石器时代的历史窗户，来探索山东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新课题。

50 年代到 60 年代初，山东境内新石器时代遗址如雨后春笋般地破土而出，这些遗址除可以归纳为龙山文化外，有些遗址出现了新的器物群，如滕县岗上村，安丘景芝镇等遗址，前者与江苏北部新石器时代遗存颇为相似，后者却又接近于山东龙山文化，新的材料已初露端倪，而大汶口遗址墓葬，恰恰包含了上述遗址中各种新因素。当时对这些新材料如何解释呢，有“混合文化”说，即“既含有仰韶文化的因素，又含有龙山文化的因素”；其年代及社会性质，有解释为“属于龙山文化系统，是氏族社会末期阶段，它不会早于两城期”。以至当年中国历史博物馆的陈列原始社会部分，把大汶口遗存曾排在龙山文化之后。但也有人认为它应是早于龙山文化的另一类文化遗存。资料的特征是新颖的、独特的、丰富的。不言而喻，客观需要，推进了对这一重要发现的研究工作。

二、器物排队、摸索方法、渐入佳境

具体编写报告的任务，由山东省文物管理处杨子范与济南市博物馆刘锡曾副馆长主持，我被分配参加整理编写。当时，我初次从事考古工作，一方面受到热气腾腾气氛的熏陶，诱发了我对这项工作浓厚的兴趣；另一方面意识到学习任务重、工作要求高，会遇到更多的困难。考古界很多学

者都关注这项研究工作，热情诚恳地给予具体指导、支持。使得工作进行较顺利。

整理编写的第一阶段，在核对大汶口遗址发掘全部墓葬材料的过程中，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刘敦愿除他本人给予我们无私帮助外，还动员他的夫人张敏君同志长期配合我们的工作，进行陶器修复。顺便说几句题外话：张敏君同志是家庭妇女，料理繁重家务外，还要当刘先生工作助手，刘先生“拾陶片”，动员夫人学陶器修复，她琢磨锻炼这项手艺，可谓考古界“夫唱妇随”典范。虽然敏君同志不幸早逝，而她修复的器物，将永远留存。核对素材，整理技术资料，要求严格的科学性，有时为了核对某一座墓葬的材料，甚至某一件器物，除了对照记录、墓葬图、照片等外，发现疑问，又必须找到发掘清理者，省文管处的袁明、李步青等同志，他们虽然不参加编写工作，几乎经常被“绑架”来与我们一起核实材料。第二阶段是找出地层关系，依据叠压与打破的墓葬，不仅表明墓地延续时间之长，而且渐渐分析出了墓葬有早有晚，弄清了早、晚器物群的组合的区别。一次又一次排比，分析，使我们对这一遗址文化面貌有了初步认识。1961年到1963年间，苏秉琦老师带着他的研究生郭大顺同志多次来济南，他和我一起排列、摸索这些“盆盆罐罐”，每当他闭着眼睛，默不出声，把一类器物反复摸索得入神时，我们在一旁屏住声息，等待他脱口说出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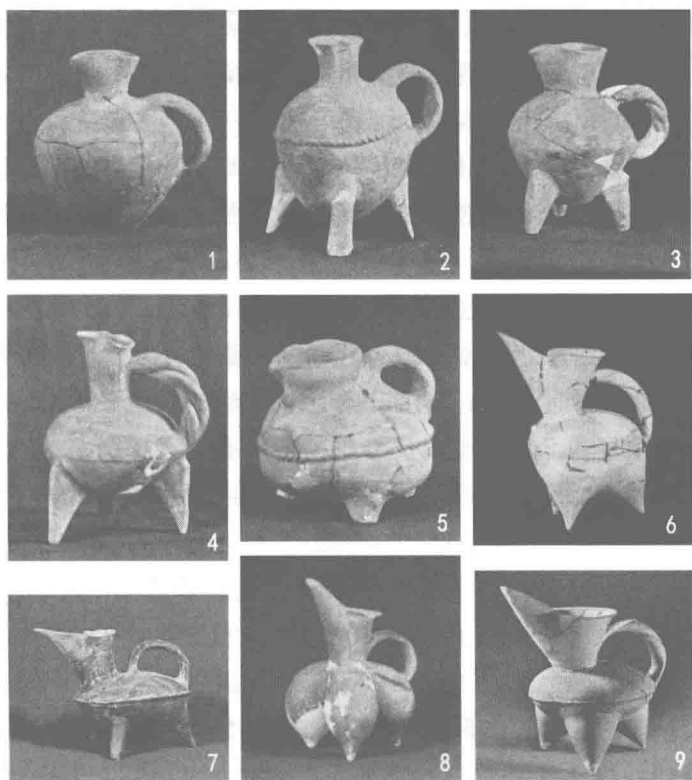
图一 苏秉琦先生辅导陈晶研究发掘器物

“奥秘”。而他却要我们把排列在面前的每一件器物，依次背出出自哪一座墓葬，说出它的特征，变化。他循循善诱地向我们指出：“考古文化的分型分式，不是个肤浅的课题，如果停在表面，那就一文不值了，譬如你们摸过了大汶口遗址的材料，一件件地排过队，还分过期，但我要问你它的特征、性质如何加以归纳，才能称得起是科学的概括呢？这难道可以冲口而出的吗？”他还对我们说：“考古学既是科学，不但应该是逻辑的，还应如数学一样，可以摸得出一是一，二是二那样一目了然”，惠于学子的基本方法论的启示，对于我们后来确定大汶口器物分型分式的标准及其在考古文化上的意义，有了自信与把握。

三、初步勾勒出大汶口文化的谱系

只有消化资料，才能立下升华的基础。我们终于在大汶口遗存中看到了山东陶鬲的家族史的起源和发展。它的最早形态，不过是比壶多了三个实足和把手而已，但不能小看这三个足的功能，它把原本一件只能着地面放的器物，支撑“腾空”了。由实足鬲演化到袋足鬲、空足鬲又经历了一系列的革新，由厚壁到器壁匀薄，它的质料由耐火不高的夹砂土到采用能耐高温的坩子土，而且在造型上已形成了一种艺术美。探索器物演化，生产技术的改进，仅凭推论、想象，不可能得出完整的结论，有时还得通过实验来证实。譬如通过陶鬲“世系”的排列，弄清了白陶的发生阶段，它出现在这批墓葬的晚期墓中，数量多又集中。毋庸置疑，当时在大汶口生活的人们，他们一定找到并且已开采制作白陶的原料。据此，我们也做了一次有目的的“实验考古”，1962年冬上，杨子范、蒋宝庚，还有一位女同志，我们四人从济南出发，先到泰安（泰安道廊遗址出土的成批白陶，与大汶口遗址的白陶形制相似），沿途调查，一直到宁阳县，始知磁窑这一地点至今还在开采一种坩子土，那里距大汶口较近，在产地取回坩子土样品，模拟大汶口人用手捏制白陶坯，烧制出的器物，几可乱真。由此可知，新材料，新的烧制技术，带来了新的成就，这支文化已萌发了向前发展的变革因素。

认识大汶口遗址出土的器物，既有文化上独特性，又包括几个发展阶段之后，初步具备系统分析的条件，客观上才有了可比性。从大汶口遗址着眼，对周围地区各遗址进行多面、多层次、多阶段的比较，至此，对于那批惹人



图二 大汶口墓葬出土陶鬶谱系

1. M81 夹砂灰陶无足鬶；2. M54 夹砂红陶实足鬶；3. M129 夹砂红陶实足鬶；4. M79 夹砂红陶实足鬶；5. M36 夹砂灰陶矮足鬶；6. M98 夹砂灰陶实足鬶；7. M47 夹砂红陶袋足鬶；8. M47 夹砂白陶空足鬶；9. M117 夹砂白陶分裆鬶

注目的红陶、彩陶、灰陶、白陶、黑陶……我们不再以陌生人相看，蒙在她身上一层有色彩的薄纱被揭开后，她的全貌显示了，也知道了她的姓氏，称“山东大汶口文化类型”，她孕育着的“龙山文化”的“胎儿”，不久就将诞生。诚如《对山东史前考古的追述与瞻望》一文所说：“山东大汶口文化的被认识，应当肯定说，是中国考古学对中国东方史前社会研究课题中的一项大的突破。”这项成果应归属于 50 年代至 60 年代中期从事山东地区考古工作的同仁。

四、余记

1974 年，《大汶口新石器时代墓葬发掘报告》出版前夕，苏秉琦老师在